

经术与性理

——北宋儒学转型考论

吴国武 著



學苑出版社

吴国武 著



经术与性理

——北宋儒学转型考论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吴国武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077-3333-4

I. 经… II. 吴… III. ①儒家—研究—中国—北宋②经
学—研究—中国—北宋③理学—研究—中国—北宋
IV. B222.05 B244.05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222 号

出版人：孟 白

责任编辑：洪文雄

装帧设计：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灵山红旗印刷厂

印 张：20.5

开本尺寸：720×980 1/16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新华书店
PDG



卷 前 语

经学是传统学术的根基，理学是宋人对儒学的新发展，二者的载体则是古代的文献典籍。吴国武博士的《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一书以经籍文献的梳理为基础，以经学、理学的互动关系为中心，以思想史研究为指归，为读者勾勒出北宋儒学转型的历史面貌。这种由文献研读通向思想解析的“古典学术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具有细致精微的长处。我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年轻学者有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高兴。

安平秋

2009.3.

注：安平秋，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儒藏》总编纂。

序

杨 忠

中国儒学的发展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过程，其间，唐宋之际恐怕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唐及唐前儒学的发展基本上以经学为主要形态，其影响所及也基本上在读书人和士大夫之中。而宋及宋以后传统经学在新的变化中逐渐孕育出理学，并融合了理学的影响，儒学以经学和理学互动互补的形式发展变化，其影响所及已经渗透到民间。所以，后代有些学者称宋以后的儒学为新儒学，清代学者在经学研究中强调汉、宋之争，都力图反映儒学的新变化。其中，北宋时期经学与理学的互动，实在是推动传统儒学转型的关键。但北宋经学与理学在儒学的发展中并非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沿着平行的轨道机械式地前行。而是在各自的嬗变过程中又交互影响着对方的发展进程，在双方的互动中共同推动并初步完成了北宋儒学的转型。

北宋时期的儒学转型对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开了新的风气。我曾在为杨新勋博士的大作《宋代疑经研究》所写的序中说：“宋代疑经不仅促进了儒学的新变，也对理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弄清宋人疑经的原因、历程、内容、方法、理论、影响等，有助于弄清宋代儒学（特别是经学）演变的原因、轨迹和影响，从而进一步理解汉、宋学术变迁的内因与外因。实际上，汉唐与宋元是中国经学史的分水岭，我们今天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在很多方面都奠基于宋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对传统思想的理解在很多方面也都奠基于宋人。而宋代经学之所以有许多新变，追根溯源，与宋人疑经且形成风气，有莫大之关系。因此，理清宋代疑经脉络，

总结其思想与特质，对揭示宋代经学特色的形成与本质，推进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杨新勋博士的研究较深入地揭示了宋代儒学（特别是经学）演变的原因、轨迹与影响，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汉、宋学术变迁的内因与外因。但北宋儒学是如何在经学与理学的互动中转型的，却需要另作具体的探讨与研究。可喜的是，最近将要出版的吴国武博士的新作《经术与性理——北宋儒学转型考论》，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研究课题的一部重要成果。

宋代经学与理学关系研究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老课题。只是过去的研究或重经学，或重理学，各自成系统，少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全面系统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宋代经学与理学发展的实情却是二者共生纠结、交互影响的，不能着力在此处开掘，终不能搔到痒处。吴国武博士专注于北宋经学与理学互动关系的研究，在某些方面填补了前人研究的空白。由于经学与理学都牵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发展，前人的著作繁多，文献丛杂，诸说并立，歧见纷出，要从源头与发展变化中理清头绪，实非易事。更具难度的是，宋代的经学与理学在文献佐证和义理审核两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是宋代社会历史演进和经学、理学各自的发展和互动的结果，也体现了经学、理学因社会、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的自身调整与修正。要较准确地把握这些复杂的情况，并从理论上加以总结，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和识见。

吴国武博士注意北宋经学与理学赖以发展的时代大背景，特别论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崛起对北宋政治、制度文化的深刻影响及这种影响对北宋经学新变与理学形成的重大作用，使所论与北宋时代的政治学术文化紧密挂钩。作者较有条理地辨析了儒学、经学、理学、宋学、义理等概念，指出应动态地看待这些概念在学术发展中的变化，从而使过去讨论中的一些模糊与纠结得到梳理，使讨论有了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作者分别从文献学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论析了经传文本的选择与性理典籍的形成、经解体式的变化与理学文体的出现、经学的子学化与理学形态等问题以及北宋经学到理学的思想转型与学术互动的基本线索和历史演变。辨析论证多有新意，且多有文献资料的佐证与支撑。比如，在研究视野上，将“儒学”看作一个包含政治、文学、教育、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整体，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多种学术形态。这种视野不同于一些学者将儒学史窄化成单一的哲学史、思想史的努力。又比如，在研究思路，强调“辨章学术，考

镜源流”。通过考察，作者提出北宋所谓“义理之学”就是“自得之学”，义理指其内容、自得指其方法境界，这与一些学者拘泥于“义理”、“性理”、“心性”、“道德性命”等词的解释不尽相同。通过考察，作者强调北宋经学高度发达，在考据、义理、辞章、经济四个方面（所谓“经学四科”）均有发展，并将儒学转型的根源归结于“理学歧出于经学”。

作者在论证北宋儒学转型时特别致力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论。比如，北宋儒学的文献转型是前人很少系统关注的，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指出北宋理学是经学子学化产物。又比如，宋初儒学（特别是经学）具有守旧开新的特点，作者从“复古明道”入手，论述了时人已致力于“圣人之道”的讨论（所谓“崇礼义，尊经术”），“庆历正学”则是其延续。作者从“圣人之道”的内容入手，指出仁宗朝儒学从“礼乐刑政”转至“仁义道德”，最后走向“道德性命”，这是经学形态变革、理学形态萌生的重要线索。

吴国武博士新作的基础是他于2002年至200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时撰写的学位论文。其实他在北大攻读硕士学位时已对中国学术史研究倾注心力，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周末宗族演化与学术变迁之关系》曾得到许多老师的肯定。后来参加《全宋诗》的整理，开始接触宋代学术资料，故攻读博士学位后我和他讨论他的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时，便能很快确定了研究范围与论文题目。他毕业至今已近四年，论文经过不断修改打磨才决定出版。近数年来，他在经学与理学的研究方面有不少论文发表，并专注于文献的辑考，发表过《董道〈广川诗故〉辑考》，又编著了《宋代经学编年》，是一位用力甚勤而又力求严谨的年轻学者。研究学术史能从文献出发，从文本的研读比较和独立思考中发现问题，提出新见，避免了天马行空式的思想史阐述，这是吴国武博士的追求。他这样做下去一定会有更大的创获并拓展出更宽广的研究领域。

2009年3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杨忠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目 录

序	杨 忠 (1)
引 论	(1)
第一章 北宋儒学及其经学、理学形态	(15)
第一节 “有体、有用、有文”：北宋儒学	(15)
一、“儒学”、“新儒学”、“宋学”	(16)
二、北宋儒学的学术渊源、特点和成就	(20)
第二节 疑古、通经、议论：北宋经学	(27)
一、作为学术形态的经学	(28)
二、北宋经学的学术渊源及历史特点	(31)
三、北宋群经学述略	(34)
第三节 “义理”、“物理”、“性命”：北宋理学	(39)
一、作为学术形态的理学	(39)
二、北宋所谓“义理”、“义理之学”	(42)
三、北宋理学的历史发展和内涵特点	(48)
本章小结	(55)
第二章 士大夫的崛起：北宋经学新变及理学歧出之背景	(57)
第一节 北宋的政治文化	(58)
一、“右文尊经，以为家法”：引经义议政	(59)
二、“君子、小人之大分”：士大夫党争	(64)
第二节 北宋的制度文化	(69)
一、“迺英讲学，游心圣道”：经筵讲读的日臻成熟	(69)
二、“根经术”、“本道理”：科举取士的不断改革	(73)
三、“横经讲评”、“学统四起”：官学私学的迅猛发展	(77)

本章小结	(81)
第三章 经、子之间：北宋儒学的文献转型	(83)
第一节 经传文本与性理经典	(83)
一、本经与传记	(84)
二、从本经次第和偏重看北宋儒学	(90)
三、从传记次第和偏重看北宋儒学	(94)
四、性理经典的形成	(106)
第二节 经解体式与理学文体	(112)
一、从传记类体式到注疏类体式	(113)
二、从注疏类体式到北宋的议论类体式	(118)
三、理学文体的形成	(128)
第三节 经学的子学化与理学	(133)
一、关于经学之儒与子学之儒	(133)
二、北宋经学的子学化过程	(136)
三、经子互动下的北宋理学	(140)
本章小结	(141)
第四章 注经或论道：北宋儒学的思想转型	(143)
第一节 北宋经学思想和理学	(144)
一、北宋经学思想概述	(144)
二、“通经致用”与“明体达用”	(150)
三、“道问学”与“尊德性”	(155)
第二节 《易》、《春秋》与北宋理学	(158)
一、从“天人之道”到“圣人之道”	(158)
二、“易乃性与天道”：北宋易学与理学	(160)
三、“正王道，明大法”：北宋春秋学与理学	(166)
第三节 《诗》、《书》、三《礼》与理学	(171)
一、“以意逆志”：北宋诗经学与理学	(171)
二、“二帝三王之道”：北宋尚书学与理学	(175)
三、“礼者理也”：北宋三礼学与理学	(179)

第四节 “四书”思想与理学	(182)
一、北宋《中庸》、《大学》之学与理学	(182)
二、“传道立言”：北宋论语学与理学	(186)
三、“存心养性”：北宋孟子学与理学	(189)
本章小结	(191)
第五章 北宋儒学转型的历史轨迹	(193)
第一节 “庆历正学”：理义歧出于经术	(193)
一、宋初：“崇礼义，尊经术”	(194)
二、庆历之际：“讲道德，究经义”	(199)
三、嘉祐之际：“道德性命之学始兴”	(206)
第二节 “道学先生”：经术与性理之互动	(210)
一、“先论性命”与庆历正学的分化	(211)
二、司马光、邵雍：“不治章句，必求其理”与“六经为本，不为训解”	(214)
三、周敦颐、张载：“文所以载道”与“正经然后一以贯天下之道”	(222)
四、二程：从“由经穷理”到“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	(230)
第三节 从“元祐学术”至“伊川之学”：理学、经学的离合	(235)
一、理学、经学之间：以吕大临、范祖禹为例	(236)
二、理学疏离经学：以谢良佐、杨时为例	(239)
三、存理学于经学：以刘安世、晁说之为例	(243)
四、走向理学化经学的“伊川之学”	(246)
本章小结	(252)
结 语	(254)
附 录 北宋经学、理学简表	(256)
参考文献	(295)
后 记	(313)

引 论

北宋是中国古典学术史（尤其儒学史）上最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历来就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清人章学诚（1738-1801）曾说：“儒术至宋而盛，儒学亦至宋而歧。”^①所谓“盛”、“歧”，指的就是宋代儒学既繁荣又复杂的历史状况。

关于北宋儒学发展的性质，前贤时彦或言“复兴（renaissance）”，或言“转型（transition）”。实际上，“复兴”一词源于“欧洲文艺复兴”，带有浓厚的近代烙印，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太吻合。我们更愿意用“转型”一词，它表明儒学的学术演变，不包含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对于这种转型的原因，向来说法不一。但是若从内在动力来讲，经学与理学两种学术形态之间的互动无疑是北宋儒学形态转型最重要的表现之一。^②本书正是试图以经学与理学之关系为中心来考察和讨论北宋儒学的学术转型。

此时，原有的经学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兴的理学也应运而生，二者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既交融又有别，既分立又胶着，而且还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鉴于两宋学术史有较强的关联性，本书的“北宋”在时段上将延伸到南宋高宗初年。^③

众所周知，自汉以来，经学就是儒学的主要形态；而自宋以来，理学也一度成为儒学新的重要形态。北宋至晚清，经学与理学一直是一对若即若离、相互依赖的儒学学术形态。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往往成为历朝各派学者的讨论焦点，宋以来学术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多与之相关，比如朱陆学之辨、汉宋学之争。

① 《章学诚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章学诚撰，刘承干编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390页。

② 本书从学术形态的角度来讨论北宋经学与理学之互动，有关经学和理学概念的性质、内涵和外延将在第一章第二、三节作详细说明。当然，佛、道二教的刺激也很重要，但不在于本书讨论之列。

③ 本书立足于“北宋”，涉及“南宋高宗初年”情况大体是“北宋”的延续。所以，关于南宋高宗初年的讨论仅限于已在北宋进士及第者或稍有名望者。

其中,理解北宋儒学的转型更离不开经学、理学之关系的考察和讨论。

历史上,很少直接使用“经学”、“理学”两个概念来指称二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代之以“讲经”与“讲道”、“文”与“道”、“章句”与“义理”、“经术”与“性理”、“解经”与“论道”等近似的说法。元初编《宋史》,区分“儒林”与“道学”,此后一度成为“经学”与“理学”的代名词,只是其区分带有明显的程朱学派特征,不足以成为讨论的基础。直到清初,顾炎武(1613-1682)提出“经学即理学”^①，“经学”和“理学”才逐渐成了讨论的固定说法。晚清以降,一些学者从汉学、宋学中走出来,比较倾向于使用“经学”和“理学”两个词;同时,清政府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厘定学校课程时,“经学”和“理学”也成为两门正式课程。鉴于此,本书主要使用“经学”和“理学”两个词,但考虑到北宋时期的复杂情况,有时也会代之以当时盛行的说法。

据我们的观察,从北宋到晚清,古人的有关讨论经历了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是北宋至南宋初,主要表现为经学与理学之互动,其结果是经学逐渐纳入理学学术形态之中,演变为经学与儒学(新型儒学)的从属关系。第二阶段是南宋中期至明末清初,主要表现为理学内部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其结果是理学逐渐回归经学,演变为经学即理学的同一关系。第三阶段是清中后期,主要表现为经学内部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其结果是经学、理学同为儒学的两翼,演变为知行互补关系。

一般认为,理学形成于北宋时期,经学新变也在北宋。过去的学者多用“宋学”、“理学”、“新儒学”等术语涵盖宋代学术,很少区分经学、理学两种儒学学术形态。他们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儒学转型,但只是将其简化为从经学到理学的学术演进,缺乏对北宋时期儒学学术转型背景下经学与理学之间的互动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一研究,无疑应该从经学在北宋发生的新变及随之而来理学的歧出开始。虽然前贤时彦对此有足够的关注,但是多数人带有门户、学科之见,对北宋经学的全面发展缺乏完整的认识。我们认为,北宋经学在考据、义理、经济、辞章四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这也是儒学学术转型的坚实基础。而理学根植

① 此言出自清人全祖望(1705-1755)的总结,参见《鲒埼亭集》卷一二《亭林先生神道表》(收入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227页)。

② 有关宋明时期的讨论,参见拙作《宋明学者论经学与理学之关系》一文(刊于《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八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于北宋经学，尤其深化了其义理和经济两个方面的内容，变“文义之学”为“义理自得之学”，变“通经致用”为“明体达用”，至南宋中期最终成为宋代新儒学的代表性力量。

从学术史来看，北宋至南宋初经学与理学之关系和南宋中期以后的情况在性质上很不一样。前面已经提到，南宋中期至明末清初主要属于理学内部的问题，清中后期主要属于经学内部的问题，而北宋时期则基本上是两个学术形态之间的互动问题。再加上，这一时期经学本身在变，理学也经历了较长的形成过程，每个阶段、每个学派甚至每个学者在如何处理经学与理学之关系上都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和实践，其复杂性可想而知的。正因为这样，以经学与理学之互动为中心讨论北宋儒学的学术转型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理解经学与理学各自的内涵及其发展历程。有的学者简单地把北宋时期的经学等同于理学，这既是顾炎武“经学即理学”论影响的结果，也是沿用清人所谓“宋学”概念所导致的误解。^①也有学者索性把理学看作北宋经学中的一个学派，这是因为他们把理学当成洛学，缺乏对理学性质的动态把握。^②还有学者借用“文化思潮”的概念，将北宋理学解释为理学思潮，并以之涵盖当时的经学新变，这与当时经学和理学发展情况也不尽相符。事实上，经学和理学是密切相关的两种学术形态，其内涵往往与当时的学术认知有关。

第二，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理解理学如何参与从北宋真、仁之际的经学新变到两宋之际经学逐渐理学化的过程。从经学史来讲，理学化经学至南宋孝宗乾、淳之际才初步形成，即所谓《四书》、《五经》为次第的经学新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建立离不开理学的推动，学者们对此深有同感。不过，北宋经学朝义理化方向的发展一直呈现出多元的倾向。至两宋之际，理学化经学才逐渐胜出。这一切，都需要在二者之互动的讨论中才得以窥其全貌。

第三，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理解北宋经学在理学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① 国武（指本书作者，后同）案：必须指出的是，顾氏之说反映了明末清初诸儒对经学与理学关系的认识，而北宋时期正是理学从经学中歧出的阶段；清人眼中的“宋学”概念完全将“宋学”等同于理学，忽视北宋经学的多样性。

② 国武案：洛学是以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学派，但理学不是一个学派，详见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的有关论述。

北宋时期，作为新学术形态的理学从产生到发展一直就离不开经学。无论从理学主要术语的兴起，还是从理学的学术规模和思想倾向来讲，经学都是其重要基础。有的学者习惯于强调佛、道二教的影响，当然不无道理。^①然而，理学毕竟是儒学，经学自身的嬗变始终是其形成的主因。关于这一点，也需要在二者之互动的讨论中得到更深的认识。

第四，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探索南宋以来各朝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梳理宋以后理学的兴衰和经学的变迁问题。南宋以来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大多可以从北宋时期的情况中找到相似点。同时，有关宋以后理学兴衰和经学变迁的研究也离不开两者之间历史关系的深入考察。可以说，理学兴衰系于经学，经学变迁也系于理学。近人研究理学史，往往从近代西来的范畴、概念入手，着重哲学的视角，忽视经学的整体性影响，将理学仅仅视作一种哲学，与历史事实有一定的差距。近人研究经学史，又多拘泥于专经和经学家个人，不太注意经学与理学之间的整体互动，有的甚至还排除那些没有经学专著的学者，这样的经学史是不完整的。

可以说，考察和讨论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历史关系，对于理解宋以来的经学史和学术史显得尤为重要。前彦时贤往往站在学科式的哲学史、思想史立场来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从传统经学史和古典学术史的角度切入更应当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就北宋而言，经学、理学之互动无疑是理解这一时期儒学学术转型的关键。

二

20 世纪以来，有关北宋经学、理学、儒学的论著在古典学术史研究中占据相当的地位，但是多侧重于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单一研究，比如北宋主要经学家及其经学著述、主要理学家及理学著述的研究、北宋经学之思想或理学之哲学研究。相比之下，真正从经学与理学之互动的角度专题讨论北宋儒学学术转型的论著却不多，直到 80 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改观。

^① 关于佛教的影响，大体上有极深说和刺激说两种。前者以陈寅恪、熊十力等为代表，后者以张东荪、牟宗三、唐君毅等为代表的，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年，651-655 页。）当然，两种主张都还有很多的支持者，我们赞同后一种说法。

尽管如此,近现代学者对北宋儒学转型问题持续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节就20世纪以来的专题研究作一个概观式的回顾,而大量的非专题研究将在正文相关论述中提及。^①据我们的初步考察,近现代学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之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

1. 20世纪初至1949年

这一阶段的专题讨论很少,但在研究思路对后来的学者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有必要提及一些重要的非专题研究论著。

二三十年代,多数学者是从讨论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说而涉及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的。尽管只是辨析顾炎武之说,但多针对于北宋至晚清一般情况而言。比如,梁启超(1873-1929)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1895-1990)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0年,梁启超指出:“(顾)炎武未尝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②理学为解经流派是清人的旧意见,也是后世学者把宋代理学混同于宋代经学的重要依据。但梁氏不同意此看法,而强调“理学即哲学,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③此论遂开理学的哲学式研究之先河,于是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问题往往转变成了经学与哲学之关系问题。

后来的论著多是将流派式和哲学式两种研究思路结合。一方面,承接清人旧意见的学者,往往从经传研究的角度讨论北宋理学形成的经学史背景。比如,马宗霍(1897-1976)的《中国经学史》。另一方面,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学者,则多阐述北宋理学的经学渊源。比如,冯友兰(1895-1990)的《中国中古近古哲学与经学之关系》明确提出理学与经学之关系的主题。^④当然,仍有个别学者注意到传统意义上经学与理学之不同。比如,钟泰(1888-1979)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谈“宋儒的道学”时说:“以经为求理之阶梯,而不认经为可以尽天下之理……理虽在经中,而亦非专于守经所得。”^⑤其间,最早作专题讨

① 本书所谓专题研究,包括经学与宋明理学之关系的宏观讨论、北宋儒学转型的考察、经学与北宋理学之关系的概述、北宋理学家之经学考察、北宋经学对理学的影响等方面。

② 《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10页。

③ 同上书,11页。

④ 见《清华周刊》第35期,1931年2月;后收入《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

⑤ 《中国哲学史》,新世纪万有文库本,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86页。

论的则是陈钟凡(1888-1982)。他在1929年发表的《宋代思想家之论证法》一文中从思想流变的角度讨论了宋代理学的经学渊源。^①

不过,这一时期经学与理学(哲学)之关系仍是主流意见。这种思路的优点是抓住了理学有思辨性的一面,而且确认其与传统经学有不同;缺点是,忽视了理学本身的丰富性。后来的研究者,多数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北宋儒学转型问题。

2. 1949年至80年代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第二阶段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即中国大陆地区和港台海外地区。其中,大陆地区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影响大,很少直接研究北宋经学,对北宋理学又多采取批判态度,有关二者之关系的研究进展不大。港台海外地区学者在继承民国学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则多有论述。其中,学术思想史家在旧经学史思路上有新的突破,哲学史家从经学方面细化了其与作为哲学的理学之关系。

第一,中国大陆地区

除了意识形态以外,学科壁垒的限制也是大陆地区学者有关研究几乎停滞的重要原因。属于中国哲学学科的专家多讨论北宋理学的哲学问题,对经学的作用注意得不充分。属于专门史学科下经学史方向的专家多沿用清人的旧意见,笼统地将北宋经学与理学等同起来;属于古典文献和历史文献学科的专家则从文献学角度把理学排除在经学之外,其有关讨论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属于专门史学科的思想史学者反而能跳出哲学史、经学史的拘束,其研究有些涉及二者之关系,个别学者还有新的认识。

与第一阶段相仿,讨论二者之关系也是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命题开始的,最突出的是侯外庐(1903-1987)。50年代中期,他指出顾氏“不是说理学等于经学,而是说理学为经学的一部分,言理不能离开经罢了”。^②此说再一次肯定了理学是解经流派。50年代末,他区分北宋六子(即司马光、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道统心传式”和王安石“新义式”两种理学^③,指出王安

① 见《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8集第91期,1929年7月(即《两宋思想述评》第四章,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② 《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206页。

③ 《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441页。

石一派也讲“道德性命”，这种观点客观上拓展了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的讨论空间。同时，提及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的还有周予同（1898-1981）。^①总的说来，他们比较倾向于北宋经学与理学（解经流派）之关系。这种思路的优点是，绕开了经学、理学各自的复杂内涵，处理起来比较简单；缺点是，把理学的形成仍然解释为经学的哲学化或儒学的哲学化。

第二，港台海外地区

港台海外地区学者继承民国学者的优点，视野比较开阔，既对北宋经学和北宋理学有明确的界线和深入的研究，又能较为客观地讨论二者之间的历史关系。根据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采取的方法之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思路。

其一是钱穆、韦政通（1930-）、余英时（1930-）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史研究思路。他们对经学和理学同等重视，故而能够从两者之关系来把握北宋时期的儒学转型。1970年，钱穆的《宋之新儒》、《宋代之理学》指出北宋经学与理学之关系即经学与子学之关系。^②1974年，韦政通在此基础上总结北宋时期“从经学之儒转回到子学之儒”^③。这是二者之关系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北宋儒学转型研究中重要的内在理路，可惜后来的学者对此重视不够。1976年，余英时在《宋代儒学及其内在问题》一文中采用南宋以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二词指称宋代经学与理学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钱先生的研究思路。^④

其二是张君勱（1887-1969）、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等学者的哲学史研究思路。他们强调理学在儒学史上的正统地位，故而立足于经学来讨论作为哲学的北宋理学。1964年，张君勱在《评梁任公先生〈清代学术概论〉中关于欧洲文艺复兴、宋明理学、戴东原哲学三点》一文中强调经学和理学之不同，认为理学也要自经学中求之。^⑤1968年，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一书

① 《中国经学史讲义》，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896页。

② 见《朱子学提纲》第四、五条，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③ 《中国思想史》（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643页（本书最早于1974年由台湾大林出版社出版）。

④ 见《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⑤ 《义理学十讲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08-109页。